

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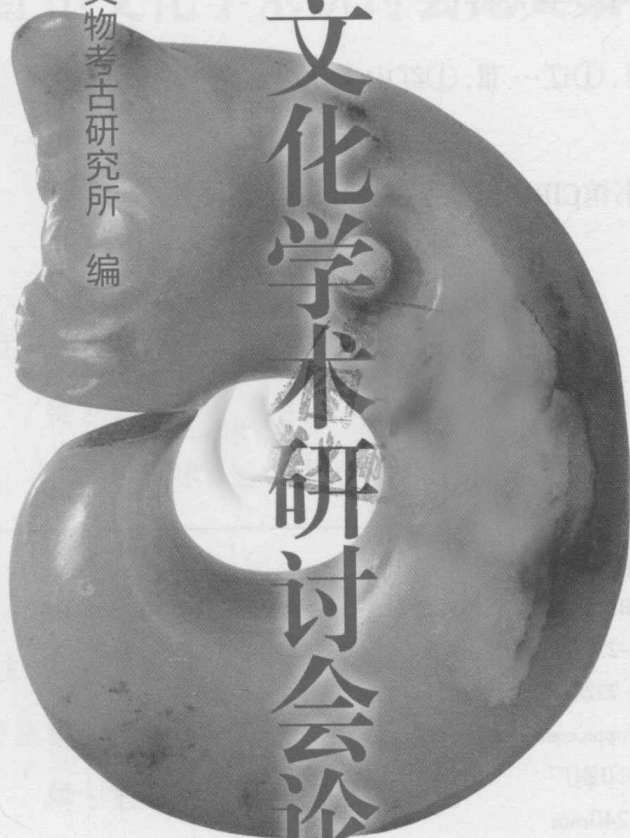
 辽宁人民出版社

紅毛文化藝術集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05-07888-1

I. ①红… II. ①辽… III. ①红山文化—文集 IV.
①K871.1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3376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4

插 页: 2

字 数: 357千字

出版时间: 2013年1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艾明秋 赵维宁

装帧设计: 琥珀视觉

责任校对: 吴艳杰等

书 号: ISBN 978-7-205-07888-1

定 价: 180.00元

红 山 文 化 学 术 研 讨 会

2012.12.14 晚 19:00





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牛河梁遗址管理处



《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周连科

副 主 任：丁 辉 李向东 吴炎亮

编 委：王文书 刘胜刚 穆启祥 李维宇 李新全

华玉冰 李龙彬 孙立学 郝建旭 刘贵廷

主 编：吴炎亮

副 主 编：李新全 华玉冰 李龙彬 孙立学

执行主编：李龙彬

编 辑：熊增琬 李 霞 郭 明



序 言

2012年岁末，反映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成果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正式出版，再次引起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研究的关注。为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牛河梁遗址及红山文化的考古研究，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的指示，并得到省文史研究馆的支持，由辽宁省文化厅、辽宁省文物局主办，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管理处承办，于2012年12月14日—17日在沈阳举办了“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高校、有关省市兄弟院所和中国台湾、香港的近百名知名教授、专家学者围绕牛河梁及其他红山文化遗存发表了许多观点新颖、内容精彩的论文，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红山文化考古与研究的现状。本论文集就是这次研讨会的成果。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从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以来，经过20多年艰苦细致的科学发掘，对重点遗址作了全面揭露，向世人展示出辽西山区距今5000年前的一处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为一体、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群和人文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文化景观，以及一批造型奇特、工艺精湛、区域特色鲜明的玉器。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对于牛河梁遗址的发现高度重视，将牛河梁遗址作为他创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文明起源论述实践的重点，给予很高的学术评价，他站在中华文化和文明发展总体的高度，认为牛河梁遗址已进入古国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从而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不仅先走一步，而且其影响不只局限于对本区域、本阶段，而是具有全局意义，是中

华文化这棵大树的直根系，对后世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他称牛河梁发现的女神头像“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还是牵动亿万中华儿女心弦的大事，所以牛河梁遗址的发现除了在学术界掀起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探讨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等重大学术问题的热潮之外，其影响还超过专业界，在社会各界都引起很大反响。随着媒体对牛河梁遗址的长期关注和成果的不断公布，社会的关注持续不断，至今方兴未艾，一个考古遗址和考古学文化能有这样长时间持续和广泛的影响，在全国来说也是很少有的。

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以及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的发表，也为这处遗址的保护、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全面详尽的科学资料。为了永久保护这处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国家文物局、辽宁省人民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地方各级政府和文化行政部门在不断加大对遗址的保护力度，继1986年由辽宁省人民政府将牛河梁遗址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了50平方公里的法定保护范围、1988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前后由国家文物局和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了《牛河梁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之后，近些年来，又开始了以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目标的遗址保护和展示工程。朝阳市在国家和辽宁省的支持下，下大力量回填矿坑，基本恢复了遗址的环境原貌；2004年建设的京四高速公路在设计通过建平和凌源两县城的路线时，为避开遗址区，决定开凿和搭建近5000米长的山洞和高架桥；近日，早年建设的公路101国道也移出遗址中心区，使遗址的环境得到有效的恢复和保护。在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要求下，对遗址本体也进行了不同方法的保护和展示实验。辽宁省考古所在这里设立的考古工作站经过整修，也在完善发掘、教学、研究条件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尽力为到这里来工作的学者和同学们提供了一个舒适方便的“家”，得以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在遗址现场对牛河梁遗址和红山文化进行身临其境的研究。

由于牛河梁遗址内容极为丰富，有许多过去很少研究的课题，所以，这

个遗址虽然发现和研究已进行了近30年，但很多研究还是初步的，还有许多不熟悉的内容需要我们去揭示，田野考古工作也还需要继续进行。2010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又在牛河梁遗址区内外发现多处红山文化遗址，附近凌源田家沟积石冢的发掘也进一步补充了对牛河梁遗址和红山文化的认识，邻近的内蒙古赤峰、通辽地区近年也不断有与红山文化有关的重要发现，看来，对整个遗址区仍需要作进一步详细的考古调查并制定长远考古规划。

从这次研讨会讨论的内容看，有红山文化分区与分期研究、墓地类型研究、聚落形态研究、红山文化玉器的宗教功能与社会组织功能研究、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研究、红山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等；科技方面的学者还在科学实验和分析的基础上，对红山文化居民适应气候、环境、地理条件的能力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等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研讨中也提出一些问题，如包括分期与类型划分等有关红山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还需加强；对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观点；红山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实验分析；西方学者还将牛河梁遗址与世界著名文明遗迹相比较，提出了从世界史角度研究红山文化的新观点。这些都展现出红山文化研究的广阔空间和前景。

我们希望，在此次学术研讨会所取得的成果和论文集出版的基础上，继续加大研究力度，进一步深化对牛河梁遗址和红山文化的认识，并将研究成果体现在遗址保护和展示中，以不断扩大牛河梁遗址和红山文化影响，将这一象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全面而形象地展现给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朋友们。

周连科



序 言	周连科	001
写在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出版之际	郭大顺	001
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遗址发掘述要与初步认识	朱永刚	012
红山文化的聚落群聚形态	徐昭峰 谢迪昕	019
鸟兽纹玉佩与牛河梁第二地点方位布局的设计理念探析	董 婕 朱成杰	027
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序列与谱系再认识	张星德	038
魏家窝铺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综合研究	孙永刚 赵志军	049
试论牛河梁及周边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	栾丰实	058
红山文化社会的管理系统	雷广臻	080
渔猎文化与“萨满式文明”	郭大顺	091
红山文化人塑像	索秀芬 李少兵	102
论红山文化坐姿人形造像的性质	田广林	125
红山文化的鹰形玉器与中国东北地区的猎鹰信仰	黄翠梅	141

红山文化权贵的头饰	宋 建	158
中国早期文明的红山模式	朱乃诚	168
红山文化的位置	李新伟	189
从殷商传统看红山文化	于建设	201
以图像对比分析方法讨论红山文化与商文化渊源	孙 力	207
牛河梁遗址出土红山文化斜口筒形器	黄建秋	238
斜口筒形玉器非龟壳说	蒋卫东	251
故宫博物院藏红山文化玉器研究	徐 琳	262
关于勾云形玉器的相关问题	杨 晶	285
关于红山文化抽象变形类玉器的解读——以玉猪龙和玉勾云形器为例	周晓晶	304
“红山系玉器”研究的再思	邓淑苹	321
良渚玉器（神人）兽面像与红山勾云形玉器的比较研究	方向明	347
红山文化勾连涡纹纹样的演变——以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为中心	郭 明	364
编后记		374

写在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出版之际

郭大顺

(辽宁省文化厅)

1983年冬,我和孙守道先生合写的《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一文预定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由于该文两年前曾提交在杭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而未收入年会论文集,编辑部为慎重起见,特派责任编辑于可可同志到沈阳来与作者见面并核实资料。不久,可可同志调文物出版社第一图书编辑室,也就是这次负责编辑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的部室,于是我们有个约定:出三本专刊,一是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代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一是翁牛特旗大南沟墓地发掘报告,代表红山文化之后的一个时期;一是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代表4000年前后早期青铜时代。这样,西辽河到大凌河流域古文化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就都有了较为系统的资料,当时我们也称为“三部曲”。后来,大甸子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观民先生主编,由科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大南沟墓地发掘报告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赤峰市博物馆合作编写,也于199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由于发掘和整理的工作量大,头绪多,又历经10多年,现在也终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

在牛河梁报告编写工作酝酿期间的2003年前后,我曾在京城的一次有关文明探源的研讨会上,听尚健在的徐莘芳先生讲过,重要考古资料一定要想法出“豪华本”。徐先生所说的“豪华本”,按徐先生本人的性格和一贯主张,不是要多么精致好看,而是要求通过版式的扩大等手段,提高资料的容纳和详实程度、图片的展开和清晰程度,从而强化报告的资料性和可用性等,徐先生当时还强调说为此可以不吝篇幅,不惜工本。不久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孟宪民同志让我多

关心一下即将正式开展的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我曾建议，利用工程项目提供的条件，可考虑将与文明探源有关的各地几个大遗址正在编写的考古发掘报告纳入到工程项目中来，出“豪华本”，当时现成的除牛河梁以外，还有如浙江良渚、山西陶寺、甘肃大地湾、广东石峡等。记得那一时期我在京见到正在与文物出版社商谈编辑大地湾遗址发掘报告的郎树德同志，曾委婉地建议他不妨将编辑工作缓一缓，等待有新的出版计划出台。以为这样做下去，即使探源项目结束时观点不尽一致，至少这批在项目之外难以实现的“豪华本”考古发掘报告就是踏踏实实的系列成果。此后因情况有变，我只能将这一愿望寄托在牛河梁报告上。2009年初，当我们最初就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编辑出版的设想与文物出版社蔡敏、黄曲同志进行初次接触时，提出牛河梁报告可以出大八开本，尽管从20个世纪50年代以后考古发掘报告已极少出这样的大开本，但他们还是答应要尽量做好。蔡敏同志还转达了宿白先生对发掘报告编写质量的关心和意见，并让我们参考宿先生推荐的一位意大利学者编著的有关印度一座塔基的发掘报告和所配的塔基平面图。严文明先生在审查报告初稿意见中也建议可将积石冢测图另外装订，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样三本加一函的规模。

面对报告，虽然仍有不少遗憾，但总算对长达20余年的发掘工作有了个交代。为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在报告里特意增加了“整理与编写报告体会”（第一章第三节）。这里再对在报告编写过程中体会较深和在报告中占篇幅较多的几个问题作些补充回顾与论述，一是对积石冢分期与结构的认识过程，二是陶筒形器的有关问题，三是关于出土玉器。

一、积石冢分期与结构

牛河梁遗址发掘开始后，我们的一个强烈感受是，与一般常见的土遗址不同，这次我们面对的发掘对象是石头堆筑的遗迹，而且规模很大。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最好不要遇到有早晚关系的堆积。然而当把各积石冢遗迹的表面和四界陆续揭露出来以后，石块与石块间的叠压关系已在不断显露出来，而且有的叠压情况还相当复杂，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对这石块与石块之间的早晚

关系如何辨别、如何处理，用传统土质遗址的叠压与打破关系的处理方法已不能完全适用。于是，考古发掘工地现场曾经出现过将遗迹表面揭出后数年不知如何下手的情况，为此，苏秉琦先生批评我们像个不负责任的医生，把病人推上手术台，拉开肚子，医生却干别的事了。好在经过了几个年头的现场反复观察，最终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积石冢的分期，一是冢的结构。分期主要是在第二地点四号冢（N2Z4）南部发现的几座墓葬，它们的筒形器不是如已知诸积石冢陈放于冢之上，而是摆在与墓口同一平面的四周，墓葬方向也不是已知诸积石冢的东西向，而是南北向，又反复辨认出这批墓葬迭压在已揭出的四号冢主体积石冢之下，特别是将这几座墓的筒形器起出后，发现其形制与已见诸积石冢的筒形器有很大差别，这就从地层叠压关系、冢墓的结构差别、墓葬的不同方向，特别是筒形陶器在形制上的明显变化几个方面的对应，将第二地点四号冢分为下层积石冢和上层积石冢，该地点其他冢未见到下层冢的迹象，但偶有下层冢特有的筒形陶器残片出现，其他地点（N5Z1、N5Z2、N16）在冢的结构、墓葬方向和筒形陶器上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变化，牛河梁以外地区发现的积石冢筒形陶器的形制特点，也有类似变化，说明牛河梁遗址积石冢下、上层的区别，在红山文化具有普遍性。这就不仅从总体上解决了牛河梁遗址积石冢的时代和分期，也为红山文化主要是红山文化晚期的年代与分期提供了一个实证，具有标尺意义。

对积石冢结构的辨认则时间更长，最终是在编写发掘报告过程中才得以解决的，这就是“冢台”的确认。这个观点是负责第二地点发掘和编写报告的方殿春同志首先提出来的。他以为，该地点的一号冢是先围绕处于冢东西中轴线上的两座对称分布的大墓（N2Z1M25、N2Z1M26），用石块在四面砌筑长方形石墙，顶部堆石形成冢台，然后在冢台之外筑冢界，筒形陶器置于冢台与冢界之间，冢台、冢界与帮垫筒形陶器所用的石料各有不同。此前，一直注意到第二地点一号冢东南角有大块石灰岩石条垒砌的部分，既有整齐的直角，又颇具规模，十分引人期盼，但又无墓葬迹象，不知如何解释，确认冢台后，知这是一号冢冢台的东南角部分；一号冢的北墙部分原有平行的四道墙，曾以为是由外向内所起的台阶，现知内石灰岩石块所砌两道石墙为冢台（冢台顶部或起两层），中

间以石片铺砌的一道石带，下垫黄土，筒形陶器紧贴在这道石片带的内侧，可知这道石片带确与加固立置于冢上的筒形陶器有关，而最外一道石板砌筑的石墙为此冢的北冢界，从而这质料规格各有不同（冢台为较大的石灰岩长条状石块，冢界为质地不一的石板，而筒形器帮衬为较薄的石片）的四道墙得到解释；筒形器在积石冢的设置也得以确认，只一排，位置在最下一层冢界的内侧，以垫土上加一层薄石板作为帮衬。此观点不仅使一号冢的结构得以读通，而且马上联想到二号冢中心墓上以前所称的“石椁”，也是围绕中心大墓而筑，与一号冢围绕两座大墓筑冢台的意图和砌法相同，应也是一座冢台，而且是一座保存完整的冢台。

记得冢台确认后我到现场对第二地点二号冢中心大墓（N2Z2M1）进行再观察，当然重点是对冢台的观察。发现第二地点二号冢的这座正方形冢台的四壁，在石料选择和砌筑方法上各有不同，相邻台壁之间又有所联系和过渡，推测这与砌筑过程中石料的供应和选择有关，还有各种形状、不同尺寸石料的挑选搭配、石块与石块间的严实咬合、砌石形成的斜行石带之间的紧凑迭罗，在缝隙中不时塞以碎石，冢台的四角还特地选用有直角的较为方正的石料，为此还随时有所加工，这些都显示出红山人对各类石材性能的准确把握和娴熟的砌筑技巧，还有整个冢台从下而上略呈复斗状的准确收分，都是追求在不加任何黏合剂的情况下使台壁一劳永逸的做法。看来当时红山人对这座墓方形冢台的砌筑远非随意而为，而是在整体上事先有所设计，具体操作则有严格的程序，好像对每块石料的摆砌都很考究，从中似乎可以透视出当时有秩序的社会组织、有专业化分工的工匠甚至指挥者的身影。那天天气清爽而时有微风掠过，开阔的工地只我一人，四周极静，我久久凝视和抚摸这埋藏 5000 多年至今仍完好保存的建筑杰作，似乎感觉到，古人在与我对话，那种感受，真有融于天地沟通之中的意境。

由此，我们对积石冢结构的认识，不再限于表面的形状，起台阶、封土积石等笼统的看法，而是有了对各细部的分析，在发掘报告中也有条件对积石冢作更仔细的介绍，如对冢界和冢台的各个面，从用料、砌法上都分别给予描述。

二、关于筒形陶器

牛河梁遗址出土陶器中，筒形陶器不仅形制特殊，在史前陶器中具唯一性，而且数量也占大宗，所以，我们以筒形器作为牛河梁遗址出土陶器分类的标准，分作筒形器及非筒形器类陶器两个大类。

这种筒形陶器，最早是 20 个世纪 70 年代初见于喀左瓦房遗址，当时误将底部残片认作口部，称“倒勾口”。隔年阜新胡头沟有原状出土的筒形器才得知这是一种无底的陶器，依外形称为筒形器（见《文物》1984 年 6 期有关简报）。牛河梁遗址珍贵之处在于有多个地点、多处积石冢的筒形器可作相互比较，尤其是第二地点的一号冢（N2Z1）北墙、三号冢（N2Z3，即祭坛）的内圈、四号冢（N2Z4）下层冢和上层冢的北部，都有原位保存的筒形器群，第五地点（N5）、第十六地点（N16）也都发现有筒形器原位保存的线索，这使我们对这类形制独特的陶器的形制变化和功能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不过在整理这批筒形陶器时遇到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筒形器的出土量特大，但器形单一，同器不同部位和不同器的残片都较难分辨，造成粘对和复原难度大，最终所得复原器甚少（当然这与部分筒形器提取不及时也有很大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筒形器的整体认识。倒是在选择标本时找到了补救的办法，这就是依据筒形器的出土具有成群和成组合的特点，采取了将原状保持的残件按排列次序全部发表的原则。在整理筒形器时遇到的又一个问题是筒形器的型式划分和比较，牛河梁遗址已出土的筒形器，可明显分出四种类型，即除下、上层积石冢所出形制差异较大、早晚关系清楚的两型以外，在第一地点 J3 和第二地点 N2Z4B 北冢界墙内，还各出有在体形、饰纹各有差别的另外两种筒形器，按一般分型法，将这四类筒形器分别冠以 A—D 型是顺理成章的，但由于只下、上层积石冢的筒形器在各地点有普遍出土，具代表性，其他两种除分别出在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四号冢出土以外，在其他地点根本不见或只有个别残片露头，而且其年代关系的推定也还需要验证。牛河梁遗址周围调查和已知牛河梁遗址以外所发现的积石冢如阜新胡头沟、喀左东山嘴、建平东山岗和敖